



和那些“宗教般虔诚的热情”所驱使，并以为自己的大师“得到天启”的人们争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认真分析每一个通货膨胀计划。

凯恩斯:通货膨胀理论的新先知

在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作者的念想中,物资存货潜在着极大充裕。只要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就能实现“按需分配”。另有某类作者,幻想通过货币和信用体系的改革,把这样的天堂乐土带至人间。在他们看来,欠缺的不过是更多货币和信用而已。他们把利率视作一种人工现象。这种现象是人为让支付手段变得稀缺造成的。

他们在成百上千本书籍和手册中,狂热指责正统经济学家不愿认可通货膨胀论和货币扩张论。他们一再再三地说,一切弊端,都源于经济学这门忧郁科学的错误教导,还有银行家和高利贷者的信用垄断。他们的主要政纲内容就是:为了把货币从“节制论”的脚镣中释放出来,就要创造免费货币[Freigeld, 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的术语],授予廉价甚至无利的信用。

这一观念吸引了不知就里的大众,也深深受到政府的欢迎。各国政府,正致力于同时增加流通货币和支票存款这两者的数量。可喜爱通货膨胀政策的政府和党派,还是羞于公开承认通货膨胀主义者的信条。虽然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恰是通货膨胀和宽松货币的政策,可通货膨胀的书面辩护士,仍被当作“货币狂想者”而受鄙视。他们的学说,在大学课堂中未有一席之地。

英国政府已故经济顾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通货膨胀理论的新先知。“凯恩斯革命”就含在他公开支持格塞尔学说的这个事实当中。凯恩斯勋爵作为英国最重要的格塞尔主义者,也采用了通文文献的狄赛亚式奇异词汇,还将其引入正式文学。1933年4月8日的《英国专家论文》表示,信贷扩张带来了“化石头为面包(…)”的奇迹”。这份文献的作者,当然就是凯恩斯本人。从休谟和穆勒对奇迹的看法,到这个大异其趣的陈述,大不列颠确实走过了漫长路程。

艾蒂安·曼图斯：法国智勇兼备的经济学家

1920年,凯恩斯凭借作品《和平的经济后果》登上政治舞台。他想要证明,对于一战赔偿款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支付转移的能力。这本书记录大获成功。德国民族主义的宣传机器在各国站稳脚跟,不倦于把他说成是世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英国最明智的政治家。

然而,把英国在两次大战间歇期的自杀性外交政策归咎于凯恩斯是错的。其他力量,尤其是对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战争贩子”之类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对于绥靖政策的兴起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少数高瞻远瞩的人以外,几乎所有英国人,都支持这个最终让纳粹乘机发动二战的政策。

一位才华出众的法国经济学家艾蒂安·曼图斯逐个观点分析了凯恩斯的这部著名作品。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研究成果,无论对于经济学家凯恩斯,还是统计学家凯恩斯,甚而是政治家凯恩斯,都是毁灭性的。凯恩斯支持者实难以找到任何实质性辩解。凯恩斯友人兼传记作者罗宾逊教授唯一能拿出手的反驳是,来自一位法国人”。这个说法就好像绥靖政策和失败情绪的恶果,从没有影响过英国似的!

艾蒂安·曼图斯是著名史学家保罗·曼图斯之子,法国最著名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他为经济理论做出过宝贵贡献——其中包括1937年《政治经济学评论》刊出的对凯恩斯《通论》的敏锐批评——在他着手撰写《迦太基式的和平,或凯恩斯的经济后果》之前。可惜他没能活着看到本人作品的出版。他作为法军军官,在大战尾声时丧命于军事行动。他的英年早逝,对于法国而言是个沉重损失。法国今天极其缺乏这样智勇兼备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沾染了“布尔乔亚思想的缺陷”？

把当代英国经济和金融政策诸种缺陷和失败全怪罪于凯恩斯也是错的。当他开始写作时,英国已经放弃自由放任原则很久了。这是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罗斯金等人、尤其是费边社的成就。那些生于19世纪80年代后的人,只不过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大学和客厅社会主义者”的蹩脚模仿者。和他们批评统治体制的前辈不同,他们是政府和压力集团政策的辩护人,而这些政策之不当、徒劳甚有害,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凯恩斯最著名的敏悟是:“对于死者而言,两座金字塔、两次弥撒带来的好处要两倍于一座金字塔和一次弥撒。然而,在伦敦和约克之间造两条铁路则非如此。”这句俏皮话,显然当得起奥斯卡·王尔德或萧伯纳戏剧中的一名角色,却并不能证明在地上挖洞穴,并用储蓄支付“可以增加有用商品和服务,也即增加真实国民所得”之论。但是,它让对手处于尴尬境地,要么放过明显论点不予理会,要么用合乎逻辑而有条理的推理,来对付灵光一闪。

对于凯恩斯的伎俩另举一例,那就是他对巴黎和会的恶意描述。凯恩斯不同意克列孟梭的想法。因此,他大肆渲染克列孟梭的行头和外表,似乎难以达到伦敦服饰店的标准,以此来羞辱对手。他形容克列孟梭的皮鞋由“厚黑皮革制成,品质精良,可土里土气,有时又很怪异,用扣子而不是鞋带地系在上面”。可这个事实和德国的赔偿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在大战造成1500万人惨死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家聚在一起,给人类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而大英帝国的这位金融专家,却拿法国总理乡村风格的鞋子戏谑取乐。

14年后举办了另一次国际会议。这一次,凯恩斯不再像1919年那样是僚属顾问,而是主角之一。关于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罗宾逊教授指出:“全世界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会记住1933年在考文特花园向世界经济大会代表致敬的演出。这次大会极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凯恩斯的构想和组织。”

没有效力于1933年各国愚蠢可悲政府的经济学家,因此没有成为代表,也没有出席那次令人愉快的苗圃晚会。可他们出于其他原因,也会记得伦敦会议。这场大会标志着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国际事务史上的最大失败。而这些政策,正是凯恩斯本人所拥护的。与1933年这次惨败相比,1919年的巴黎和会似乎非常成功。可凯恩斯并没有对1933年代表的外套、鞋子和手套,予以讽刺意味的评论论足。

凯恩斯策略

尽管凯恩斯认为“被奇怪忽视,受不公对待的先知西尔维奥·格塞尔”是位先驱,可他本人的学说与格塞尔的学说却大不相同。凯恩斯从格塞尔和其他通胀鼓吹者那里借来的,不是学说的内容,而是实际的结论。还有他们用来削弱对手威望的手段。这些策略包

抛出更多过时的法西斯口号,例如“未来的浪潮”。然而,另一位撰稿者保罗·斯威齐对此看法不同。在他眼里,凯恩斯沾染了“布尔乔亚思想的缺陷”,因此并非人类的救主,不过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先驱,而这个使命就是:为英国人心灵接受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为大不列颠从意上全盘接受社会主义做好准备。

凯恩斯上盘接受社会主义主义偶像的手法,诉诸含沙射影,试图以模棱两可的措辞,让对手显得可疑。许多人心怀激赏,称颂凯恩斯的“文体卓越”和“语言纯熟”。可这实际上都不过是廉价的修辞技巧。

凯恩斯说,李嘉图像宗教裁判所征服西班牙那样彻底征服了英格兰。这个比较,极尽歹毒之能事。宗教裁判所是在法官和刽子手的协助下,让西班牙人屈服。而李嘉图的理论,则是被英国知识分子当成正确理论来自觉接受,全无外力压迫和强制。但是,在比较这两件完全不同之事时,凯恩斯转弯抹角地暗示,李嘉图学说的成功,有某些可耻之处,而那些不赞成他学说的人,就像与宗教裁判所的恐怖作斗争的人一样,是英勇、高尚和无畏的自由战士。

凯恩斯最著名的敏悟是:“对于死者而言,两座金字塔、两次弥撒带来的好处要两倍于一座金字塔和一次弥撒。然而,在伦敦和约克之间造两条铁路则非如此。”这句俏皮话,显然当得起奥斯卡·王尔德或萧伯纳戏剧中的一名角色,却并不能证明在地上挖洞穴,并用储蓄支付“可以增加有用商品和服务,也即增加真实国民所得”之论。但是,它让对手处于尴尬境地,要么放过明显论点不予理会,要么用合乎逻辑而有条理的推理,来对付灵光一闪。

对于凯恩斯的伎俩另举一例,那就是他对巴黎和会的恶意描述。凯恩斯不同意克列孟梭的想法。因此,他大肆渲染克列孟梭的行头和外表,似乎难以达到伦敦服饰店的标准,以此来羞辱对手。他形容克列孟梭的皮鞋由“厚黑皮革制成,品质精良,可土里土气,有时又很怪异,用扣子而不是鞋带地系在上面”。可这个事实和德国的赔偿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在大战造成1500万人惨死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家聚在一起,给人类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而大英帝国的这位金融专家,却拿法国总理乡村风格的鞋子戏谑取乐。

14年后举办了另一次国际会议。这一次,凯恩斯不再像1919年那样是僚属顾问,而是主角之一。关于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罗宾逊教授指出:“全世界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会记住1933年在考文特花园向世界经济大会代表致敬的演出。这次大会极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凯恩斯的构想和组织。”

没有效力于1933年各国愚蠢可悲政府的经济学家,因此没有成为代表,也没有出席那次令人愉快的苗圃晚会。可他们出于其他原因,也会记得伦敦会议。这场大会标志着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国际事务史上的最大失败。而这些政策,正是凯恩斯本人所拥护的。与1933年这次惨败相比,1919年的巴黎和会似乎非常成功。可凯恩斯并没有对1933年代表的外套、鞋子和手套,予以讽刺意味的评论论足。

凯恩斯策略

尽管凯恩斯认为“被奇怪忽视,受不公对待的先知西尔维奥·格塞尔”是位先驱,可他本人的学说与格塞尔的学说却大不相同。凯恩斯从格塞尔和其他通胀鼓吹者那里借来的,不是学说的内容,而是实际的结论。还有他们用来削弱对手威望的手段。这些策略包

括:

1)一切对手,也就是所有那些不把信用扩张视为万应灵丹的人,都被拢归在一起,被合称为“正统”。这暗示着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2)据说经济科学的发展,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身上达到顶峰,并以凯恩斯而告终。现代主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则被避而不谈。

3)从大卫·休谟以来的所有经济学家,一直在澄清货币及其替代物数量变化的结果。这些经济学家的努力被统统忽略。凯恩斯从来没有通过推理,着手完成驳斥这些学说的无望任务。

总之,文选各位作者将其大师的技巧派上用场。他们的批判靶心是一套由自己的幻想所创的学说,与严肃经济学家所阐述的理论,毫无类似之处。经济学家关于信用扩张必然结果所说的一切,被他们弃之不顾。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商业周期货币理论。

为了正确评价凯恩斯的《通论》在学界取得的成功,必须考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学经济学科的普遍情况。

在过去几十年执掌经济学教席的人中,只有少数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也即完全熟悉现代主观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人。老古典经济学家以及那些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在教材中被随意歪曲,在课堂上被大肆丑化;它们被冠以老掉牙、正统、反动、布尔乔亚或华尔街经济学的封号。大学的老师自鸣得意于驳倒了曼彻斯特学派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抽象学说。

这两种思想学派的冲突对立,表现在它们处理工会问题上的实际关注不同。那些被贬为正统派的经济学家教导说,工人工资水平要正常上升,只有在人均资本投入额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无论是政府法令还是工会压力,如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高于自由市场确定的工资水平,那么失业的恶果,就会成为永久、普遍的现象。

在那些追求时髦的大学中,几乎所有教授都尖锐抨击了这个理论。这些自封为“非正统”的空谈家,以这种方式诠释过去200年的经济史: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空前高涨,是由工联主义和政府亲劳工立法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工联主义真正有益于所有工人乃至全民。他们强调,只有那些昧良心的狡辩家,为了冷酷剥削者明显不公的利益,才会认为工联的暴力行径是错的。他们以为,政府要得人心,最该在意的,就是尽可能鼓励工作,给他们一切必要协助,压制雇主的阴谋,把工资水平设定得越来越高。

但是,一旦政府和立法机构顺从工会意愿,赋予它一切特权来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正统”经济学家预测的后果就会出现:潜在劳动力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失业。

“非正统”空谈家闹糊涂了。他们用来反对“正统”理论的唯一论证,不过是用他们自己对于经验的错误解释。可如今现实就像“抽象学派”所准确预测的那样发展。“非正统派”中一片惊慌失措。

此时此刻,凯恩斯发表了《通论》。这对于尴尬的“进步主义者”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这样,他们终于有了来对抗“正统”观点的东西。失业,并非因为不合理的劳动政策,而是因为货币和信用体系的缺陷。不必再担忧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也不必再操心公共财政赤字。消除失业的唯一办法,相反正是通过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为公共开支增加“有效需求”。

《通论》推荐的政策,正是那些“货币狂想者”老早就提出来的,也是1929年及之后大

萧条时期大多数政府所支持的政策。有人认为,凯恩斯的早期著述,在把世界上最强大的那几个政府,转化到鲁莽开支、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视这个细节问题而未决。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及其官员,并未等到《通论》发表,才开始采用“凯恩斯主义”——或更确切说,格赛尔主义的使工。

凯恩斯主义使工资率上涨的秘诀不再奏效

凯恩斯《通论》在1936年并未开创新经济政策的时代。勿宁说,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凯恩斯所推荐的这些政策,已濒临于其必然后果即将显现,其本身不可持续的时候。纵然是最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不敢说今日英国的苦痛源于储蓄太多和开支不足。“进步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被过度美化。其政策实质,就是随着收入增加,被没收的份额也越来越多——这些钱被花在公共的挥霍浪费上,被用于资助最强大的压力集团成员。

在“非正统派”眼中,任何一种政策,无论其不足有多么明显,作为促进平等目标的手段,都是合理的。现在这个过程走到了尽头。采取目前的税率,运用这些管制价格、利润和利率的方法,这个体系正在自我摧毁,已经难以为继。即便没收年收入超过1000英镑部分的每一便士,也不会为英国的公共收入带来明显增长。最顽固的费边社成员也不能不认识到,从今往后,用于公共开支的资金,必须从本该靠公共开支获益的同一批人身上获得。无论是货币扩张还是财政开支,英国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凯恩斯的状况并没有本质区别。凯恩斯主义使工资率上涨的秘诀不再奏效。新政启动的信贷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短期延迟了不当劳工政策的后果。在此期间,政府和工会头头可以自夸保障了“普通人”的“社会利益”。可现在,货币和支票存款数量增加的必然后果已然显现。物价越来越高。美国正在上演的一幕,正代表着凯恩斯主义的最后失败。

毫无疑问,美国公众正在抛弃凯恩斯主义的观念和口号。它们的威望正在减弱。就在几年前,政客们的天真谈论,还囿于以美元计价的国民收入,没把政府通胀所致的美元购买力变化考虑在内。蛊惑人心者设定了他们希望实现的国民(美元)收入水平。今天,这种形式的推论不再可行。“普通人”最后了解到,增加美元的数量,并不能使美国富有起来。哈里斯教授仍然称赞罗斯福政府提高了美元收入水平。但是,凯恩斯主义的这种坚持已见,今天只存在于课堂之中。

还有老师告诉学生:“经济可以靠自力牵引而上升”,并说:“我们可以靠多花钱来走向繁荣”。但凯恩斯主义的奇谈不可能是现实;石头不会摇身变成面包。文集收录的这些博学作家的作品,不过是证实了编辑序言中所说的,凯恩斯能从门徒身上唤起对其经济学宗教般虔诚的热情,这可被有效利用来促进新经济学的传播。哈里斯教授接着说:“凯恩斯确实得到了天启”。

和那些“宗教般虔诚的热情”所驱使,并以为自己的大师「得到天启」的人们争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认真分析每一个通货膨胀计划,无论是凯恩斯和格塞尔的,还是他们的无数先辈,从约翰劳到道格拉斯·诺斯的。然而,没人会期望任何合乎逻辑的论证或任何经验,能够动摇那些以“开支和信用扩张带来救赎”为信仰者宗教般虔诚的热情。

(禅心云起/译)

▶▶▶ [上接 A2版]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所以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就这样,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不断修补它,例如芝加哥学派。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范式上,难免爱屋及乌。比如弗里德曼认为,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现实的假设,越是好理论。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应该说,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即使预测对,也不一定是好理论,可能是因为“瞎猫碰上死耗子”。

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经常出现矛盾。比如他们对反垄断法的看法就前后不一致。1960年代前,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反垄断法》,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的。1980年代后,他们态度开始改变。这是因为上篇提到的Armentanono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没法解决。最后他们提出政府失灵理论,对抗市场失灵理论。结果变成了一个经验问题: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就看谁的失灵更多。这就是逻辑不一致,对市场支持不彻底,所以不能

决定谁输谁赢。

经济学有这么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数学应用的束缚。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现在,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上可处理来设定,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就避而不谈。亚当·斯密的分工交易、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只剩下均衡,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分工和技术进步。因为数学这么重要,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

保罗·克鲁格曼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是一针见血。现在很多人写经济学论文,你问这是什么那么假说,他说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这就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而不是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经济学要真正进步,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

9、经济学的曙光

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没希望了? 曙光还是有的。要理解市场,不得不说奥地利学派。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目前为止对

量;反过来,技术进步也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下是内生的,亚当·斯密2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理论家直到最近才重新提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重新发现了新大陆。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例如,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为什么还要出一个新品牌;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生产iPad? 因为这是企业的竞争手段。有人说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那是在古典经济学里按数学证明的均衡理论中才存在的矛盾,在奥地利学派里没有。

外部性、不完全竞争、非对称信息,都不会成为破坏市场的力量。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说它们是市场的运行方式,是因为如果没有市场,这些外部性和非对称信息本身就不存在(如没有分工,就没有产品信息的不对称);说它们是市场存在的理由,是因为许多市场机制(如品牌)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来的。政府的干预——不让企业家发挥作用,不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自主性,才是破坏市场的主要力量。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政策,本质上都是计划经济。

现在风光的品牌企业没有一个是产业政

策扶持起来的。联想是政府扶持的吗? 腾讯公司是吗? 都不是。让产业政策指导企业家投资就像让瞎子引路,一个人也许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你让一个瞎子领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往前走,结果只会更糟糕。

10、研究范式的转变

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读最新的文献,隐含的假设是:科学总是往前走的,今天的理论比昨天的理论更正确。其实这不对,科学也可能倒退。举个例子,日心说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但他的理论不被人接受。托勒密的地心说长期统治人类的思想,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日心说才被接受。经济学也是这样。凯恩斯理论出现在亚当·斯密理论160多年后,难道就比亚当·斯密理论正确吗? 不一定。

193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中,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一边,只有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计划经济。最后,到1990年苏东计划经济彻底崩溃,才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不过,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转 A4版)